

中 / 国 / 秘 / 密 / 社 / 会 / 研 / 究 / 系 / 列 /

秘密社会与 中国民主革命

周建超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

中·国·秘·密·社·会·研·究·系·列

秘密社会与 中国民主革命

周建超 著

福建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周建超著.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02. 10

ISBN 7-211-04202-8

I. 秘… II. 周… III. ①帮会—研究—中国②帮会—关系—政治—研究—中国 IV. D693.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52011 号

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

MIMI SHEHUI YU ZHONGGUO MINZHU GEMING

周建超 著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闽侯青圃印刷厂印刷

(闽侯青口镇新侨外 54 号 邮编: 350119)

开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1.75 印张 4 插页 270 千字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

200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 7—211—04202—8

D·377 定价: 19.5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在中国历史上，秘密社会（其中包括秘密会党和秘密宗教）一直作为下层群众的集合体而存在着。它们大多在原有社会组织之中另立系统，成为正统社会秩序的对立物。到了明清之际，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的秘密社会已遍布全国各地，拥有三四百种名目、数千万徒众，其势力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海外华人社会。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和中国共产党在动员群众组织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时，都面临着如何对待群众中广泛存在的秘密结社问题。因此，秘密社会与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是中国民主革命中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难题。而在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以前，没有人能够解决这一个困难的问题。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从下层群众中寻找依靠的力量，以推翻清王朝，曾积极联合发动秘密会党参加辛亥革命，但由于他们拿不出对待秘密社会的恰当的纲领、政策、措施，因而无法解决秘密社会问题。民国以后，不仅秘密社会的基础依然存在，而且它的势力还在不断扩大。在它们的组织里，不仅拥有大量的失业游民和贫苦工农群众，而且还有一定的武装力量。有的地方，秘密社会控制了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局面。帝国主义、军阀、官僚、地主豪绅势力，都想利用秘密社会达到其政治和经济的目的。因此，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对待秘密社会，采取什么政策，也就是如何

引导秘密社会群众的革命积极性，防止和克服他们对革命的危害性，成为一个关系到能否顺利领导工农革命，以及争取和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社会力量，达到革命胜利的重大策略问题。

对于上述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的研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学术界已有重视，但从总体研究上看，还是薄弱的，至今还没有一部系统论述的专著。周建超同志以《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作为博士学位论文课题，在大量搜集档案、文献、回忆录等资料的基础上，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下，运用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对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民主革命与秘密社会的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系统全面的梳理与研究，写成了二十几万字的著作，这在学术界还是首创。我以为此项研究的意义与特色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开拓性。将秘密社会的研究与民主革命的研究结合起来，应当说是一个有意义的新尝试。以往秘密社会史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前，往往以个案见长，侧重其起因、发展线索及不同类型的分析、考证；以往的民主革命，特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研究也大多集中在主要的敌我双方的斗争态势与演变发展上。本书借助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首次将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两者结合起来进行全方位的整体性的宏观分析，这不仅可以透视并比较中国的秘密社会在民主革命的不同时期所起的作用，也可以比较不同的利益群体或政治主体是如何处理与秘密社会的关系，导致了什么样的结果，从中得出有益的启示，这无疑大大拓宽了秘密社会史研究的空间。同时也为建立起更加科学的研究中国民主革命史的基本理论框架提供了深化探索的新范式，丰富了中国民主革命研究的基本内容，填补了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

第二，系统性。本书在运用已有秘密社会史研究成果的基础

上，对民主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作了一个更为周全的分析。如作者在第三章关于中共对农村秘密社会的认识与改造一节中，详尽地分析了国民革命时期在华北农村形成的空前未有的枪会运动与农民运动的关系，认为仅用传统的革命史观点或研究方法是很难说清这场波澜壮阔的农民运动的兴起、发展与壮大，必须借助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有关内容和方法，从枪会的起源、性质、影响以及当时华北农村的特殊历史环境，才能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才能再现华北农村大动荡的历史画面。同时，更重要的是作者把探索的视角集中在秘密社会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问题上，通过对秘密社会与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根据地建设、军队建设、抗日战争以及解放战争等全方位的系统研究，第一次较为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在争取、利用、教育、改造秘密社会问题上政策和策略的萌芽、形成、成熟和发展的全过程，并实事求是地评价了中共在秘密社会问题上的得失，科学地总结了党的下层统战工作经验，这大大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和理解党的奋斗历程以及“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科学论断。另外，全文结构完整，思路清晰，层次安排以时序为主线，厘清了中国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相互关系的阶段性进程。就各阶段而言，则显示特色和差异，从该时段秘密社会的形态、状况，到当时主要政治力量、集团的布局及其与秘密社会的关系，都有翔实的探讨，而重点则在于革命政党对秘密社会的政策分析。这样各阶段的论述相互衔接与沟通，论证了论文的主题，达到了既定的研究目标。

第三，现实性。研究历史，运用从历史反思中汲取的智慧，以发现现实社会中问题的实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是每个关注民族命运的历史学者的神圣职责。本书作者的一个宗旨就是通过对中国历史上秘密社会这一重大社会现象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历

史过程及其内在规律的客观科学的描述和解释，以为在现实生活中处理那些死灰复燃的帮会黑社会势力提供政策和思想参考系。秘密社会曾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也是当今世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新中国成立后，秘密社会问题在中国大陆已基本解决，但海外华人中秘密社会依然存在，港澳等地区的黑社会势力还十分猖獗。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推行，近年来一些帮会和会道门残余势力，死灰复燃，并与海外的黑社会势力相勾结，进行走私、贩毒，搞迷信破坏活动。可以说，当今中国的黑社会和一些邪教组织，与历史上的秘密社会有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因此，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展开对秘密社会问题的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是作者选择这一课题时所希望达到的目的。

周建超同志在南京大学中国民间社会研究中心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学习刻苦认真，以扎实的史学基础和理论功底完成了这篇资料丰富，结构严谨，观点正确，行文流畅，富有创新意义的博士论文。现在他的这篇论文经过修改补充后要公开出版，我作为他的导师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愿借此机会向广大读者推荐这部书，并希望周建超同志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更加努力，写出更多的佳作。当然，这本书的价值究竟如何，还有待广大读者的评说。

蔡少卿

二〇〇二年四月于南秀村

前言

在中国历史上，秘密社会（包括秘密教门和秘密会党）一直作为下层群众的集合体而存在着。^①进入近代以后，中国秘密社会组织几乎遍于国中，拥有数百种名目，达数千万徒众，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潜势力，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秘密社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扮演着十分重要而复杂的角色，它的势力已经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海外华人社会，甚至延续到现实的社会生活。因此，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全面深刻了解中国近代下层劳动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以及近代社会历史的演变，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仅从革命史这个角度来说，秘密社会问题曾经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和政策问题。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了从下层群众中寻找依靠的力量，以推翻清王朝，曾积极联络发动会党群众参加辛亥革命，但由于资产阶级的历史局限性，对会党的本质特点把握不准，加之实用主义的联合态度，以至拿不出联合会党的切实有效的纲领政策措施，因而无法改造会党，最后不得不从

^① 关于秘密社会及秘密教门与秘密会党的区别联系在第一章第一部分有详细论述。另外为了顾及前后的一致性，本书在总体叙述时将统一使用“秘密社会”这一总概念，而在涉及具体事件或人物时将根据历史时期和秘密社会具体组织而使用不同名称。

联盟走向破裂。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地孤立和分化敌人，夺取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从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到毛泽东都曾经对秘密社会作过系统研究，并为正确处理秘密社会问题作过长期的坚忍不拔的努力。从党开始领导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到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各地的清匪反霸，铲除秘密社会滋生的土壤的斗争，创造了解决秘密社会问题的十分丰富的经验。如“反对其首领，争取其群众，瓦解其组织”便是中国共产党处理秘密社会问题一项具有战略指导作用的政策策略。因此，对秘密社会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和深入地去研究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探讨和总结革命政党在认识和处理秘密社会问题上的经验教训；另一方面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深刻理解“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科学论断。这不仅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是有裨益的，而且对于世界上一切存在秘密社会组织国家都有着借鉴意义。

当然选择研究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这一课题，除了以上的认识外，还有以下考虑，这就是想努力拓展革命史的研究领域，以社会史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深化革命史研究。

历史总是要不断进行再认识与再研究的。长期以来，革命史一直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中心和主题，所有一切其他研究如经济史、文化史、中外关系史都是围绕这个中心来进行的。革命史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惟一“范式”与解释模式。换言之，就是认为对革命的理解和正面评价是理解近代以来一切社会变革的首要前提。但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思想学术的活跃，革命史传统的研究范式面临着危机，以原有的手段和方法往往很难令人信服地阐释某些重大历史事变。因而，一种变革和创新革命史研究内容和方法的呼声越来越高。如以 1924 年至

1927年发生的席卷全国的国民革命来说，首先与中国共产党制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直接相关，但这并不是说有了国共合作就自然会有国民革命。因为任何一场社会革命的发生都是由许多因素促成的，是社会合力的结果。国民革命之所以发生，是当时新的社会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新的社会因素不断发展与北洋时期社会诸领域中强大旧势力旧因素阻碍和束缚的矛盾所导致的结果。一面要发展，一面要阻碍，矛盾日益尖锐，于是社会的变迁就演化为社会革命。这也就是说国民革命的发生是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变迁的必然产物。而就这场革命本身而言，它又促进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社会心理、风俗习惯等各个领域的重大变迁。如国民革命时期华北广大农村形成了空前未有的红枪会运动，数以万计的北方农民，利用传统的宗教迷信方式团结起来，以原始的工具为武器，对抗军阀，反对剥削，谋求自卫，割据一方，形成一股股强大的军事武装集团。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震动了整个社会。所到之处，贪官污吏为之胆丧，一些反动军队也望风而逃，被誉为继明末李自成起义，清朝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之后近代中国又一农民大暴动。它们同湖广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共同写下了国民革命史上农民自身解放运动的光辉篇章。

对于如此重大的农民运动，仅用传统的革命史观点或研究方法是很难说清它的兴起、发展与壮大。以至有些人因对农民运动的内容不甚了解，斥之为“妖邪”、“落后”，甚至错误地理解为是“封建迷信团体”和“土匪”的行为等；还有些人认为它如同宗教麻痹人民，瓦解斗志；而解放后的教科书和论著中，也很少提及，这不能不说是中国革命史研究中的缺憾。因此，要弄清国民革命时期华北农村勃然兴起的农民运动，就必须借助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有关内容和方法，从枪会的起源、性质、影响以及当时华北农

村的特殊历史环境，才能对其进行实事求是的客观评价，才能再现华北农村大动荡的历史画面。所以，在研究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对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力量，不仅要从理论上掌握，而且要在实际研究过程中具体加以运用，要真正的在历史著述中找到人民群众实在的而不是抽象的身影，否则对人民群众在民主革命中的态度和作用就会陷入诸如“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和反抗”、“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等一般性的抽象描叙之中，不能真正深刻地揭示民主革命进程的广阔背景和内容。其实，无论是辛亥革命、国民革命，还是土地革命、抗日战争，秘密社会等下层群众都是参与其中的，只不过形式不同，程度不同而已。研究者的任务就是通过对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的清理，把下层社会群众的活动同时代的进程连接起来，把下层社会群众活动同重大的政治、经济、文化现象连接起来，以求全面深刻地阐释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进程和发展规律。

由此可见，社会历史是一个整体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变化是各种力量造成的。社会上层与下层、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进步力量与反动力量、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都在历史进程中表现了各自的作用，各种力量相互形成一种合力，历史按照合力所指的方向发展变化。在这历史的诸种力量中，不可忽视的是下层社会的活动，历史的前进、停滞或倒退，其中都体现了它们的作用。但长期以来我们在研究民主革命历史时，忽视了对下层社会的研究，把下层社会历史演变的许多重要课题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这是片面的做法。造成这种研究状况的原因，除了革命史研究的特定的政治背景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革命史研究领域还没有更好地借鉴其他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和方法，特别是社会史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因此，为了综合说明中国民主革命广阔而丰富的内容，

深化革命史研究，必须借助社会史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正如恩格斯所说：“人类知识和人类生活关系中的任何领域，哪怕是最生僻的领域，无不对社会革命有所影响。”^①

既然研究民主革命历史离不开对下层社会的解读，那么作为下层社会群众集合体的秘密社会就不能不纳入人们的研究视野。事实上，早在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派为联络利用会党进行反清斗争，就开始对秘密社会进行调查研究。陶成章所著《浙案纪略》和日人平山周的《中国秘密社会史》就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堪称这一时期的代表作。《浙案纪略》初稿曾在缅甸仰光《光华日报》上刊载，所有革命党人姓名皆用甲乙丙丁等字代之；1910年陶将其书稿重新整理（分成三卷：上卷为纪事本末；中卷为列传；下卷为附录；又外纪一篇《教会源流考》），准备付梓出版。但革命党人恐因此泄露反清义举，于革命不利，遂将中卷列传及外纪《教会源流考》先刻印于日本，余稿悉藏于东京。全部书稿至1916年才得以正式出版。该书对以浙江地区为中心的各地会党运动作了详尽、真实的记载，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秘密社会史著作。平山周所著《中国秘密社会史》系由他偕毕永年于1899年调查长江哥老会组织的基础上写成，于191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共六章，对白莲教、天地会、三合会、哥老会等的活动均有翔实的记载，同时汇录和保存了不少秘密社会的文件，具有极其重要的史学价值，为研究这一时期的秘密社会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辛亥革命以后至20世纪30年代前，涉及秘密社会比较重要的著述有两种：一是1918年连横以十年时间撰成的《台湾通史》

^① 恩格斯：《英国状况·十八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6页。

一书,其中不少篇幅涉及郑成功所部和南明遗老们的政治活动,涉及台湾历次天地会起义,其资料之详实,至今还被学者多方引用。^①二是1929年温雄飞在《南洋华侨通史》中探讨了海外洪门会党的情况,并对西鲁传说的原型作出解释,^②认为天地会西鲁故事中的火烧少林寺,是指郑芝龙全家在北京被杀之惨史,万云龙即郑成功,陈近南即陈永华,认为天地会系郑成功所创。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各地秘密社会重又活跃。与此相应的是研究秘密社会史的著述接连问世。其中较重要的有:1935年北平研究院出版的萧一山根据从伦敦不列颠博物院中发现的一批天地会文件整理的《近代秘密社会史料》;1935年4月中华印刷公司出版的刘师亮的《汉留史》;1940年9月李子峰根据各种海底编辑的《海底》,同年上海又先后出版了胡利民所著的《民族精神》和龙襄三所著的《洪门常识问答》;1941年澳门苗园出版的刘联珂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1943年7月正中书局出版的罗尔纲编辑的《天地会文献录》;1946年重庆出版的雷发声编的《汉留问答》;1946年12月重庆说文社出版的卫大法师所著的《帮》(又名《中国帮会青红汉留》);1947年桂南印刷厂出版的张赟的《金不换》、6月和平出版社出版的戴魏光编著的《洪门史》、7月中华书局出版的朱琳编的《洪门志》等。这些书籍,不仅保存了一批清代遗留下来的天地会文件,而且提供了若干帮会内部的口传史料。但是由于当时缺乏学术讨论的环境和气氛,并受政治气候的影响,许多书表现出直观性、通俗性和随意性的特点,很少有作者自己独到的见解,根

① 连横:《台湾通史》1920—1921在台湾分三册出版,1945年商务印书馆重排出版,1983年修订第2版,共上下两册。

② 温雄飞:《南洋华侨通史》,东方印书馆1929年版。(第十四章《天地会之来南洋及其骚扰》第一节《天地会之起源》)。

本谈不上把秘密社会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联系起来考察、阐释。至于学术论文为数极少，水准较高的论文则更是寥若晨星。

新中国成立后，秘密社会的研究才真正发展起来。但建国之初受政治环境的影响，秘密社会史并不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以研究，而是纳入农民战争史的范畴加以研究。1951年，黄芝冈在《明矿徒与清会党》一文中认为四川哥老会即官书中的“咽喉”，“原是明万历年间河南的矿徒组织”，列举材料阐明哥老会是在四川成长的社会组织^①。陈湛若和胡珠生合写的《哥老会起源初探》，认为“咽喉”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并不是“河南的矿徒组织，更不是什么‘赌徒会’”^②。此后，荣孟源的《天地会》^③，来新夏的《反清秘密结社》^④，俞澄寰的《反清的秘密结社——天地会》^⑤，魏建猷的《试论天地会的性质》^⑥，邵循正的《秘密社会、宗教和农民战争》^⑦，王天奖的《十九世纪下半纪中国的秘密会社》^⑧等文相继发表，关于秘密社会组织的讨论日益激烈。综观这一阶段的文章，虽然在阶级分析方面取得进展，但受原始资料的限制，未见重大突破。

真正推动秘密社会史研究的是蔡少卿先生在1964年发表的《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⑨。该文首次用档案史料提出了天地会是由洪二和尚万提喜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在福建漳浦创立的新观点，这使得天地会起源的研究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而这

① 《历史教学》1951年第3期。

② 《新史学通讯》1952年第12期。

③ 《历史教学》1956年第5期。

④ 《历史教学》1956年第10期。

⑤ 《史学月刊》1957年第4期。

⑥ 《文汇报》1960年12月20日。

⑦ 《北京大学学报》1961年第3期。

⑧ 《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

⑨ 《北京大学学报》1964年第1期。

一结论被誉为“本世纪我国历史学的重大发现”^①。后由于“文革”的影响，学术界对秘密社会史的探讨陷于停顿。“文革”结束后，从1979年开始，学术界围绕着蔡少卿先生一文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秦宝琦等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搜集、整理了现存档案馆的鸦片战争之前的天地会资料分七册出版。根据对清朝档案的进一步研究，秦宝琦得出了与蔡少卿先生相同的结论，认为可以把天地会创立年代定在乾隆中叶。^②而胡珠生、赫治清则不同意蔡少卿、秦宝琦的观点，并进而为康熙十三年甲寅创立说提供了新的论据。^③除此之外，张兴伯、何正清、吴雁南、骆宝善等都先后投入这场论争，从不同的角度对乾隆说表示异义。这场反复的讨论无论在广度还是在深度上均达到了高峰。

与此同时，有关秘密社会史研究的工具书、专著相继问世。由魏建猷主编的《中国会党史论著汇要》于1985年由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了1983年底以前国内出版和发表有关会党史的论文、著作、资料近900种，大部分论著都作了内容提要，是研究秘密社会史必备的工具书。1993年《河北文史资料》编辑部编辑出版的《近代中国帮会内幕》（上、下册），收录了散见于全国文史资料选辑上有关青帮和红帮文章，其中大都为当时人忆当时情、帮内人记帮内事的第一手资料，真实可靠，可使读者详览其内幕，同时也为研究中国近代社会提供了一套较为完整、系统的珍贵史料。同年万仁元、方庆秋主编的《民国帮会要录》由档案出版社出版。该书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典藏资料，收集了青

① 《文汇报》1993年4月2日。

② 秦宝琦、刘美珍：《试论天地会》，《清史研究集》第1辑。

③ 胡珠生：《天地会起源初探》，《历史学》1979年第4期；赫治清：《试论天地会的起源》，《清史论丛》第5辑。

红帮的组织活动资料，兼收一些会党活动资料，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档案资料，基本上反映了青红帮等在民国时期的组织演变及其活动概况。就专著而言，蔡少卿先生所著《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于198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著名历史学家戴逸先生为之作序，该书全面、系统地揭示了近代中国的秘密社会及其历史演变，对哥老会的源流、自立军起义、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会党的离合、南洋华人中的秘密会党等均有系统的阐述，是我国当代研究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最有影响的一部学术专著。接着，秦宝琦的《清前期天地会研究》出版；1989年连立昌的《福建秘密社会》、蔡少卿的《中国秘密社会》、何正清和吴雁南的《农民战争与会党》先后出版；1991年苏智良、陈丽非的《近代上海黑社会研究》出版；1993年周育民、邵雍的《中国帮会史》、秦宝琦的《中国地下社会》出版；1996年胡珠生的《清代洪门史》，郭绪印的《洪帮秘史》出版；1997年邵雍的《中国会道门》出版；1998年蔡少卿主编的《中国秘密社会丛书》也从1998年开始陆续出版。这些专著从不同的角度，探讨和阐述了中国秘密社会的产生、发展和灭亡的历史，标志着研究条件的日臻成熟。此外，我国台湾省于1981年出版了庄吉发所著《清代天地会源流考》，专章介绍了天地会与清季革命运动，运用台湾故宫博物院所藏军机处档案，资料翔实。同年又出版了庄政所著《国父革命与洪门会党》，着重探讨了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与秘密会党的关系，是一部专门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秘密会党的学术专著。1973年、1990年戴玄之先后出版了《红枪会》与《中国秘密宗教和秘密会社》两本专著，也是大陆学者研究秘密社会值得参考的著作。

以上简单地回顾了20世纪初以来秘密社会的研究历史，期间经过几代学人的共同努力，秘密社会的研究成果和资料都日益丰富和完备，各家论点日益明确，若干重大疑团问题有所突破，研

究体系逐步形成。但从这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仍然存在着偏颇，这主要表现在：

第一，就指向而言，研究与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辛亥革命以前秘密社会的发展状况，特别是对秘密社会的起源、成分与性质的讨论，而对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秘密社会的整体发展研究用力较少。

第二，就个案研究而言，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侧重于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红枪会、青红帮等著名大型结社，而对较小的地方组织和某些著名结社的支脉派别则较少展开，即使对白莲教、天地会、哥老会等也偏于宏观性地概括，而对若干具体情节的分析评论和对其本身文献的准确理解与诠释则尚嫌不足。如白莲教是流传于黄河以北地区，以迷信为纽带，组织群众，进行反清斗争的一个有较长历史的秘密结社，对它的活动方式、教义教旨、会众成分都已有所研究；但对它如何从湖北开始活动，逐渐伸张势力于河南，形成白莲教聚会中心，然后向皖北、淮北、山东、直隶、山西各地发展的轨迹及社会背景的联系等方面，则有待深入探讨，而对其支派闻香教、八卦教（天理教）、神奇教、在礼教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支脉更少见专门论述。^①

第三，就秘密社会与民主革命的关系而言，研究者的目标大多集中在太平天国革命和辛亥革命，而又以后者为最多，成果最丰。但所有这方面的研究又大都是从革命史的角度出发而旁及秘密社会，也就是说并未把秘密社会置于主体地位而来论述其与民主革命运动的关系。至于秘密社会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就更少有人从整体上研究，专著几乎阙如，有关论文也鲜见。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秘密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的许多薄弱环节之一。

依据上文对革命史研究范式转换和秘密社会史研究现状的分

^① 来新夏：《关于中国近代秘密社会史的研究》，《漳州师院学报》1995年第3期。